



甘做共产主义铺路石

——寻乌古柏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马晓敏 罗雪梅

古柏烈士纪念碑坐落在江西省寻乌县革命烈士陵园内。碑顶屹立着古柏手拿文件、目光坚定、一身正气的全身铜像，高4.7米，基座用花岗岩和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碑体正面镶嵌着邓小平题写的“古柏烈士纪念碑”七个镀金大字，背面刻着碑文：

古柏，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九日出生于江西省寻乌县董乡塘背村。青少年时期，就读于广东省梅县广益中学、学艺中学，曾积极参加和领导梅县地区爱国学生运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创建中共寻乌县支部。一九二八年春，领导和发动寻乌“三·二五”暴动，创建红军第二十一纵队，并先后任纵队政委、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兼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一九三〇年五月，协助毛泽东进行著名的寻乌调查。历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党团书记等职。在贯彻毛泽东正确主张，抵制王明“左”倾错误斗争中，坚持真理。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中，作出了卓越贡献。主力红军长征后，奉命留在中央苏区闽粤赣边领导游击战争。一九三五年三月六日，在广东省龙川县鸳鸯坑与敌激战中壮烈牺牲。

古柏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工农红军的优秀指挥员，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中共寻乌县委员会
寻乌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六年三月六日

简短的碑文，概述了古柏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和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读来令人肃然起敬。

信者不惧的共产主义战士

1906年12月，古柏出生在江西省寻乌县的一个破产小地主家庭，从

小目睹农民悲惨生活的他对贫苦农民有着深切的同情。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有一次，资助古柏求学的外公梅洪馨劝他只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就保证送他到日本留学。古柏却说：留学固然好，但洋学问也不能救国救民。梅洪馨一怔，半晌才说：“自古以来，时代之变迁，政党之初期发展，一定要牺牲不少青年，为党铺平道路，党之主义才能实现，难道你愿意做共产主义的铺路石吗？”古柏坚定地说：“我愿意这样做！没有铺路的人，哪有康庄大道可走？”梅洪馨惊问：“难道你不怕死吗？”古柏从容地回答：“信者不惧！”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陷入低潮。古柏回到家乡积极组建农民协会，开展革命活动，创建了中共寻乌支部。1928年，他领导和发动了有五六万农民参与的“三·二五”暴动。暴动失败后，古柏不顾敌人多次悬赏通缉，再次回到寻乌，重新恢复农会活动，组建了赣南红军第21纵队，依托阳天嶂大山开展游击斗争。1930年初，古柏领导创建了寻乌革命根据地，在区、乡、村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全县掀起了一个革命高潮。

毛泽东寻乌调查的得力助手

1930年5月，为了弄清中国富农问题和商业状况，毛泽东在寻乌作了著名的寻乌调查，并写下《寻乌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两篇光辉著作，首次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而这些都和古柏密切相关，时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的他全力协助毛泽东组织了这次调查。

古柏不仅陪同毛泽东走街串巷，深入商店、作坊、群众家里和田间地头作调查，还根据毛泽东调查的主题和思路，精心挑选小商贩、曾在旧军队当过排长的苏维埃干部、曾任县衙

门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的乡苏干部、前清秀才、乡村教师、店员等各个阶层的代表共11人来开调查会，后又邀请近60人来参加调查总结会，为毛泽东全面了解情况做了大量工作。

寻乌有句俗语：“请客吃饭，请了还要拖。”请人吃饭尚且如此困难，更不要说开调查会了。寻乌调查规模大、覆盖广、内容多，对调查对象的选取提出了较高要求。此外，调查对象的个性、心态、对革命的认识不一，选取的调查对象是否合适、全面，是否愿意参加，是否能讲真话，这些问题的解决，既需要他全面了解寻乌各方面的情况，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还须具备出色的组织能力。因为寻乌方言不好懂，在调查会上，古柏不仅负责记录，同时还担任“翻译”。会后，他还协助毛泽东整理调查会记录，研究分析调查资料等。

毛泽东对古柏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高兴地对朱德说，“有收获，这个县城有意思。古柏熟悉情况，他忠厚随和、宽以待人，在寻乌各界都有朋友”，并在《寻乌调查》中写道，“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

对党忠诚的优秀代表

1931年，由于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和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古柏遭到错误批判，被撤销党内外职务。但他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夜以继日地奔赴会昌、长汀等地，出色完成了征粮任务，做好了党交给他的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古柏奉命留守中央苏区。11月，整个苏区全部陷入敌手，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进行了血腥屠杀、疯狂报复。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古



柏带领闽粤赣红军游击队，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1935年2月，古柏带领战友们辗转来到广东省龙川县上坪乡，准备在这里继续发展队伍。3月6日清晨，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包围了游击队驻地鸳鸯坑。听到枪声的古柏立即组织大家突围，命令大家赶紧从后门冲出去，他来掩护。大家安全撤离后，他正准备想办法撤离时，敌人却摸到了他身后，向他连开数枪。古柏不幸中弹，应声倒地。就这样，年仅29岁的古柏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践行了“甘做共产主义铺路石”的铮铮誓言。

毛泽东在延安得知古柏牺牲的噩耗后，深感痛惜，亲笔题词：“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1984年7月，邓小平为古柏烈士纪念碑题写碑名，并题词：“古柏烈士，永垂不朽！”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陈 航

滕代远：戎马一生的新中国首任铁道部部长

在《中国共产党简史》中，滕代远的名字共出现了3次：第1次是在第44页：“（1930年）8月，红一军团同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共3万余人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后两次在第47页：“在湘鄂赣，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从湘赣返回这一地区后，会合当地游击队，扩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和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创立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平江起义的党代表。1904年11月2日，滕代远出生于湖南麻阳。1924年10月，滕代远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1月，滕代远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5月21日，长沙发生了血雨腥风的马日事变。时任中共长沙郊区委员会书记兼郊区农民协会委员长的滕代远当晚正在韭菜园圣经学校的区农会主持会议，听到枪声，他立即中断会议，边指挥阻击边组织大家突围。之后，敌人在长沙城内到处贴出布告，悬赏三千大洋捉拿滕代远，还出动大队人马挨家挨户地搜捕。在群众的保护下，滕代远一次次虎口脱险。

1928年7月，根据中共湖南省委指示，彭德怀、滕代远发动了著名的平江起义。在庆祝起义胜利的大会上，滕代远以湖南省委特派员身份，宣布成立红五军，彭德怀为军长，滕代远为党代表。8月，滕代远与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与湘鄂赣三省敌军周旋，于12月10日到达宁冈，与朱德、毛泽东的红四军胜利会师。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南进军，在外线打击敌人。滕代远与彭德怀从大局出发，动员红五军官兵担当起保卫井冈山的重任。1929年1月，因敌我力量悬殊，井冈山失守。为保存实力，

彭德怀、滕代远率领500多人突围来到赣南于都。5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部队重返井冈山，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立下了不朽功勋。

不帶“总”的军委参谋长。1935年夏，滕代远受党中央委派，前往苏联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作了题为《保卫自己和独立》的发言，着重介绍了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的英勇事迹和取得的重大胜利。1936年，滕代远化名李光在莫斯科出版了10余万字的《中国新军队》一书，第一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中央红军的发展史。

1937年12月，滕代远按照中央指令从新疆返回延安。毛泽东对他说，委任你为军委参谋长，不加“总”字，和我一起管八路军、新四军。于是，滕代远走上了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岗位，主持军委参谋部的日常工作。

滕代远紧紧抓住军委参谋部一局（作战局），通过他们把敌、伪、友、我军的部署与动态摸清楚，并做出综合分析。滕代远特别强调时效观念，曾给一局立下一个规矩：凡是前方来的电文，连同译电原稿，都先送他亲自过目，做出批示后再交给有关人员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向他报告。他每天要处理几十份甚至上百份电文，从不积压。他要求一局每天必须作分析研究，经常撰写综合报告，经他审阅后呈毛泽东、王稼祥等军委领导人，为中央军委及时制定战略方针和对敌斗争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把对手当作评分员的抗大副校长。1940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滕代远出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总校副校长兼副政委。滕代远率领全校师生把战场当课堂，在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反日军“扫荡”作战中，他命

令抗大600余名师生组成阻击部队，在洪岭、三十亩地等战斗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当时，抗大总校许多连队距离战场只有一二公里，学员和日军仅仅隔着一个山包。滕代远和教员们授课时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在山洼里上大课，在山坡上战斗操练时敌人冲上来了，说撤就撤，该打就打，敌人走了继续学习。许多在课堂上搞不明白的作战指挥要素和关节点，在战后总结讲评时教员稍一点拨，学员就心领神会了，而且会记住一辈子。

“战斗就是学习，学习也是战斗”成了当时抗大鲜明的办学特色。滕代远强调：“抗大的教学是否成功，要拿到真刀实枪的战场上去检验。你的作战对手——敌人恰恰会是我们抗大学员学习成绩的评分员。”通过不断摸索、总结、创新，逐步形成了滕代远特有的“严、实、深、细”的治学作风和教学风格。

自1940年到1942年，在滕代远担任主要领导的几年里，抗大总校培训出学员万余名，他们边学习、边战斗，锻炼成为能文能武的优秀指挥员，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指挥百万铁路大军开山修路，遇水搭桥。1949年1月28日，军委铁道部第一次铁道工作会议在石家庄召开，朱德亲自参加会议，宣布成立军委铁道部的命令。之后他对代表们说，“中央给你们派来个‘将军大老

板’”，指出今后滕代远要掌管铁路，要指挥百万铁路大军，开山修路，遇水搭桥，抢修抢运，支援大军过江，解放全中国。从此，滕代远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铁道建设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军委铁道部改为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滕代远针对中国铁路实际存在的问题，参照苏联铁路建设经验，在铁道部其他领导同志的协助配合下，连续召开了运输、调度、工程、机务、运价、财务等一系列会议，大刀阔斧地推进铁路统一管理，明确铁路工作的指导思想，建立起分级管理、统一调度指挥的全国铁路管理新体制。

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在修建过程中，大桥的基础工程采取什么样的建设方案曾一度存在严重分歧。滕代远经过缜密的调查与研究，顶住各方压力，否定了沿用100多年的“气压沉箱法”，坚决支持具有创新思路的“管柱钻孔”方案，确保了大桥建设的顺利推进。大桥建成后，既经济、美观，又稳固、安全，使用年限可达100年。

滕代远常年保持着过去战争年代经常下连队的作风，经常深入基层检查工作。一次到重庆，天气炎热，重庆市委负责同志为照顾他的健康，请他到宾馆去住，他不同意，坚持住在车上。滕代远说：“我们搞铁路的人，两根钢轨就是我的岗位，我在车上睡得踏实，离开岗位就不是铁道部长了。”



两次生死考验中走出来

□ 高中华

巍巍井冈，成为革命的摇篮。毛泽东率领部队上井冈山，把红旗插到了罗霄山脉，开始恢复与重建地方县委，建立各县工农兵政府。随着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革命武装发展扩大。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后，开展土地革命，使农民迅速认清了国共两党的优劣，发展根据地，接连粉碎了国民党军多次“进剿”“会剿”。

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中，善于总结斗争经验，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等重要著述，从国情出发揭示了红色政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认为这是取得保存和发展革命的一条有效途径。后来朱毛红军下井冈山，开创了赣南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为其他根据地提供了斗争经验。尤其是古田会议的召开，明确了思想建党原则和政治建军方略，强化了党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

至1930年夏，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建立了15个较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基本形成。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举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开展廉政建设、经济建设，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政权建设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发挥了对处于被分割状态的各个根据地的中枢指挥作用。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开始战略转移。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集结重兵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军事负责人放弃了毛泽东、朱德创造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采取了军事冒险方针，而当进攻受挫后又消极避战，终导致根据地不断缩小，革命再次出现新的危机。中央负责人博古报请共产国际同意后，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离开了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在实行这次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在国民党湘军和桂军夹击下，付出了极大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锐减到3万多人。严峻的形势使党和红军内部更多的人认识到，务必尽快调整军事路线，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否则将有覆巢之危。

在危在旦夕的紧要关头，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坚持了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集中讨论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问题，主要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了公开的严厉的批判，认真开展了一次批评和自我批评，集中解决了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尤为重要的是，遵义会议不仅重塑了党中央的权威，也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成为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它在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遵义会议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改变了以往机械的军事打法，根据战场实际，敌变我亦变，在变化中寻战机，在战机中歼敌，时而声东击西，时而忽南忽北，即打即离，迂回跳转，纵横穿插于敌军之间，打乱了国民党军整个作战部署，强渡金沙江，终跳出了几十万敌军的层层“铁桶”包围。

主力红军长驱数万里，翻山越岭、斩关夺隘，过草地、跨大河，风餐露宿、绝地求生，实现了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保存了革命的骨干力量，最后奠基大西北。西北是中国革命全盘战略中的薄弱环节，三军会师于此，可谓上策之举。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控制东北；后集结重兵越过长城，向关内进军，蚕食华北。国内抗日救国运动高涨，并推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力主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新的危机中蕴含着新的生机，中国革命再次迎来新的局面。

从大革命失败到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0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生死攸关的严峻考验，奇迹般地度过最黑暗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遇挫弥坚，心怀革命必胜信念，以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以“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汇聚成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在风雨兼程的复兴之路上，红色血脉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经历了大革命失败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两次生死考验。经历了大风大浪的共产党人愈加坚毅与成熟，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愈加深刻，走向了独立自主的革命新阶段，实现了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战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江苏、浙江等省也相继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遭遇了极其严重的困难。据党的六大时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竟达31万之多，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这对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次极其严峻的生死考验，工农奋起的潮流被湮灭，仅剩些许火种。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革命前途仿佛已变得十分黯淡。中国革命向何处去呢？

紧急时刻，中共中央立即在汉口秘密召开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毛泽东指出务必要有自己的“枪杆子”，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给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真正的革命者是吓不倒的，他们揩干净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一些追求进步、向往真理的人士，在革命危急时刻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的队伍，受尽压迫的工农群众重新在党的周围逐步聚集起来。涓涓细流，终成大海。

方向既明，何惧路险。党中央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此诞生，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毛泽东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革命开始走向复兴。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进攻长沙。在各路起义军进攻损失严重之时，毛泽东当机立断，令起义各部队停止进攻，退到浏阳县文家市集中。9月19日，各路起义部队到达文家市，毛泽东即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心先将革命火种保存下来，寻求立足之地，将部队带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稳住阵脚，徐图再起。部队行至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从组织上建立党的各级组织，设立党代表制度，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以上有党委；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在政治上官兵平等，经济上公平。这就开始改变了起义军中旧军队的习气和不良作风，成为党的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